

論藝文

劉俊松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分类 K201.1/50 (3)

编号

无锡市教师进修学院

文藝散論

刘綏松 著

< 19570 >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76840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7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近年来的论文集，共有十二篇，其中有：
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及对其某些作品的分析；对胡适、
胡风的反动思想批判和对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
艺思想的批判。它对一般文艺工作者及文艺爱好者，
有一定的帮助。

文 藝 散 論

刘 綏 松 著

*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湖北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紙 $\frac{1}{32}$ 開 · 4 $\frac{3}{16}$ 印張 · 2 插頁 · 99,000 字

1955年10月第 1 版

1957年9月第 2 版

1957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數：27,501—29,700

統一書號：10107·33

目 录

魯迅后期杂文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	1
魯迅是苏联人民和苏联文学最忠誠的朋友.....	15
讀‘彷徨’中的三篇小說.....	22
魯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繼承者和捍卫者.....	33
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問題.....	44
俞平伯的錯誤思想主要表现在哪里.....	61
批判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想.....	70
胡风是魯迅精神的歪曲者.....	84
批判刘雪葦的‘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97
一篇不朽的史詩——‘列宁’.....	108
工业战綫上的英雄主义.....	116
紀念偉大的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作家——拉伯雷.....	124
重印后記.....	131

魯迅后期杂文中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这几年中間，魯迅先生經歷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段极其深刻而彻底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时期。经过这次自我批判和改造以后，魯迅先生达到了他的生命中的更高、更光輝的境界：他在中国革命陣地上作为思想斗士和文学作家的战斗实績，是較之前一个时期，更加卓越和偉大了。这首先是，因为从这时候起，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已經不再是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場与观点，以及进化論的观点出发，而是一个科学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大众革命的力量和前途，已經沒有絲毫的怀疑，而是坚信‘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了；因此，从这时候起，他在探索什么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的时候的那种苦悶、彷徨的情緒，已經不再留有絲毫的阴影，而且因为与中国革命大众的紧密的結合，而具有无限坚强的信心与力量，更加坚决地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当成是中国革命有力的宣傳鼓动的武器了。

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無論是就魯迅先生本人，或是就中国新文学运动前进的历史看来，都是非常地重要的。这个发展，一方面标志了作为思想家的魯迅先生前后期思想的本質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标志了作为文学家和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的魯迅先生在創作方法上前后期的显著不同的面貌。从这时候起，貫串在魯迅先生作品里的，就已經不是前期（‘五四’时期）的批判的现实主义（魯迅先

生前期的现实主义是比资产阶级批判的现实主义更前进了一步的)，而是后期（‘左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

鲁迅先生在他的后期（‘左联’时期）是以杂文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为其主要的战斗武器的。在这个时期内，他的作品除了收在‘故事新编’中的五篇寓言式的短篇小说外，其余几乎全部都是杂文。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前所写成的杂文，后来收集成册的，计有：‘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八个集子，另外还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拾遗’里。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采用杂文这种文学形式来做他的主要的战斗武器，也就是说，鲁迅为什么几乎全部放弃了他在前一个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发挥了巨大战斗作用的小说的写作，而来专门地写作这种短小精悍的政论性的杂文呢？这是有着他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理由和原因的。关于这一点，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集’的序文里曾经有过极其透辟的分析。他说：‘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①

秋白同志这一段话，十分扼要地根据鲁迅先生当时的客观环境

①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第二页，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订正再版。

和雜文這種藝術形式的特殊作用，說明了魯迅先生為什麼專門利用雜文這個文藝武器來進行堅苦鬥爭的真正原因。然而原因還有魯迅先生主觀的一方面；而這是與魯迅先生的一貫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和方法有着非常密切的關連的。

如所週知，魯迅先生開始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就不同於別的家，他不是根據自己個人興趣和前途的需要而來從事寫作的；他有着非常明顯的利用文學藝術來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崇高的願望和目的。他說他之所以要開始創作小說，是‘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①這種對於創作的崇高的願望和目的，到了魯迅先生的後期，不徒沒有改變，而且顯得更加積極和明確了。這是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的一個方面。而另外，同其他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他又是嚴格地認爲人民生活才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的。他主張‘革命文學家要寫工農羣衆，必須熟悉工農羣衆的生活，首先作家自己必須工農階級化，必須深入工農羣衆，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②。‘但是，魯迅先生，在後期，和廣泛羣衆——尤其工農羣衆直接接近的自由是完全被剝奪了’^③，所以魯迅先生‘認爲在還不能寫工農羣衆的時候，就不要勉強寫’。^④這又是魯迅先生的嚴肅認真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的另一個方面。

雖然舊中國的反動統治者曾經殘酷地剝奪了魯迅先生接近廣大工農羣衆的可能，雖然他們想一手扼殺我們這位傑出的導師的創作生命，雖然魯迅先生因爲失去了進行創作所必須的生活泉源，而不

①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一〇八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②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九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③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八六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④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九二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得不暂时地放下他的创作小说的如椽大笔来；但是鲁迅先生却还是非写作不可，非战斗不可的，因为正在深入地发展着的中国革命的形势需要他写，他的‘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的思想认识迫促他写，而他的对于腐朽黑暗的旧中国社会制度的无比愤恨和他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暂时艰苦而到底一定要胜利的坚强信念，也在时时刻刻地要求和鼓舞他写。于是鲁迅先生，在左联时期就不得不以杂文这种文艺形式来作为他的战斗的主要武器，同时，他在本时期所写的杂文，也就不能不具有他在前期小说中的那种真实而具体地剖析和描绘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上的和艺术上的伟大特色。而且，更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后期杂文中，随处洋溢着强烈分明的阶级爱憎，以及他的不怕困难，无视危险的大无畏的精神，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们，是一种强大的鼓舞、教育的力量。而这些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最本质的特色。

鲁迅先生的后期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那些晶莹而犀利的杂文，具有着高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他在经过了比较长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艰苦斗争之后所获得的那种明确而坚强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的信念和他的那种坚持思想斗争的坚毅的精神意志，是完全地熔铸到他后期的杂文中来了。

我们不曾也不会忘记一九三〇——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左翼作家联盟时期的这一个充满了艰苦和斗争的年代。那是中国革命势力遭受了挫折而仍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地发展的年代；那是中国的

●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二〇页，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订正再版。

反動統治者——蔣介石匪幫以白色恐怖殘酷地鎮壓中國革命、大規模地屠殺廣大革命羣衆的年代；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中國的賣國政府，強佔了我們的東北，並想進而席捲全中國的年代；同時，這也是魯迅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和全國各大城市向反動統治者及其幫兇、幫閒的走狗們進行堅韌不屈的戰鬥的年代。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便很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和它的最本質的特徵，並以此教育、鼓舞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抗和革命的意志。

魯迅先生從‘五四’時期起，一直堅持着與‘吃人’的統治者的鬥爭，一直以他的雜文來揭露從有階級社會以來的‘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反映‘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和‘悲慘的弱者的呼號’，而且還要喚醒廣大青年們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這樣的工作，到了他的後期，是顯得更爲堅實和有力了。他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①他的後期雜文便切實地執行了這樣的戰鬥任務。他揭露了存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裏的尖銳的矛盾和鬥爭，刻畫了反動統治者的兇殘無恥的醜惡的嘴臉，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勞動人民的苦難的生活和中國革命的必然要勝利的前途。他看到：‘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②；他看到：‘在事實上……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槍砲’^③，他說：‘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

①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二三九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②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二六七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③ ‘魯迅全集’第四卷，第二七一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⑤。但是他更看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⑥而且由此，他更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⑦，‘……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⑧。在这里，鲁迅先生不只指出了旧的腐朽的事物之凶残的面貌与其必然的溃灭，同时，更加重要的是，他也显示了新的革命的力量之逐渐地壮大，而且必然地会获得胜利。这是他的后期杂文中最显著的特色；而这样的一个特色，正是由于他真实地、具体地描写了左联时期的最本质的历史特征而产生出来的。

在鲁迅先生后期杂文里，也刻画了旧中国统治者另一种卑贱无耻的面貌：对日本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极端的丑态。这种丑态，正好与反动统治者对于中国劳苦大众和爱国青年的狰狞面貌，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在‘文章与题目’（‘伪自由书’）一文中，鲁迅先生十分尖锐地撕开了‘攘外必先安内’论者的最实在的思想：‘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和‘外就是内，本无可攘’^⑨这三种无耻之尤的思想。在‘友邦惊诧论’（‘二心集’）一文中，鲁迅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媚外而屠杀徒手请愿的青年学生的罪行，提出了极其强烈的抗议；同时也指出了国民党的所谓‘友邦人士’，原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一伙的强盗。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伪自由书’）一文中，鲁迅先生更揭露了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之流的东

⑤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六页，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⑥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一九页，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⑦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九八页，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⑧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六页，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⑨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五四三页，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西，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獻‘征心’策的出賣靈魂的醜態。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道路上，魯迅先生以他的鋒利的筆端，把侵略者及其走狗們的窮兇極惡、卑賤無恥的面貌揭露在中國人民大眾的面前，激發了他們對於敵人的強烈的仇恨；同時，魯迅先生也以他的深厚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深深地教育了中國人民大眾，使他們知道怎樣在自己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為中華民族的徹底的自由與解放而鬥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於魯迅先生曾經有過極其崇高的評價。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①毛主席的這種精確的推崇和估價，我們是在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中得到完全真實的證明了。

魯迅先生在後期，又以他的雜文表現了中國人民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的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誼，滿懷熱情地指出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對於喝血的帝國主義，是一個致命的威脅，而對於爭取自由和解放的中國勞動人民，則是走向戰鬥和勝利的強大的鼓舞力量。他說：蘇聯革命的成功，是‘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又說：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要進攻蘇聯的原因，是因為‘工農都像了人樣，于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②。然而，‘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痼疽，是他們的寶貝，那末，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

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六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②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二七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了。……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①魯迅是一個卓越的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是緊密而不可分割的。他憎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反動統治者，因此，他不能不憎恨和呵斥那作爲他們的主子的帝國主義；他熱愛中國人民，因此，他不能不熱愛和讚揚那同情與支持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蘇聯。而魯迅先生，也就以他的辛勤的工作來證明和支持了自己的主張。他翻譯、介紹了許多蘇聯的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的書籍，一方面以新的精神、道德，教導了中國的廣大讀者，並且也使年輕的中國革命文學在蘇聯文學的灌溉與扶助之下，日益滋長和壯大起來。他說：‘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却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却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②魯迅先生不僅爲我們說明了過去‘中俄兩國文字之交’的發展的歷史，而且也預示了將來‘中俄兩國文字之交’的日益輝煌的前途。就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也有着非常堅強樂觀的信心。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發展的歷史，從來就是跟各種反動的唯

①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三——三二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② ‘魯迅全集’第五卷，第五七——五八頁，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

心的文艺思想作斗争的历史；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就是在这种不停的斗争之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在扫清革命文学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一重要工作上，担负了主要的战斗任务。他与替帝国主义作‘宠犬’的‘民族主义文学’作斗争，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之类的人物作斗争，与那些自称为‘死抱住文学不放手’的‘第三种人’作斗争。（同时，他也与自己阵营里的不正确的倾向和思想作斗争。）他以他的利刃般的笔锋，剥露了各色各样的敌人的‘吧儿狗’似的脸孔，粉碎了他们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理论’，因而，他使我们的革命文学在反动派的高压与迫害之下，大踏步地向前进军。日丹诺夫在关于‘皇’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即伯林斯基、车尔尼雪夫司基、杜布罗留勃夫底伟大传统底继承者，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和具有社会倾向的艺术的守护者。普列哈诺夫写作了许多东西来揭露那种对于文学和艺术唯心论的和反科学的观念并保卫我们俄国伟大革命民主派底基本原理，这些伟大革命民主派曾教导我们把文学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强有力的手段。’[●] 鲁迅先生在他的后期，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和他的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批评，捍卫了我国正在困难中前进的现实主义的和有社会倾向的革命文学艺术。他的杂文中这一部分的作品，到现在依然照亮着我国文学艺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续前进的道路。

我们把鲁迅先生后期杂文作了这样一个粗略的、概括的叙述，主要的目的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是真实地、具体地在革命的发展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特征，而且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教育和鼓舞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而这正是社

●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五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最基本的特色。鲁迅先生在后期所达到的思想上的和艺术上的高度，正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左翼作家联盟时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鲁迅先生在左联时期的杂文之所以可能达到如此的高度，他的文学事业的道路之所以可能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认为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而这也接触到我们今天应当向鲁迅先生学习什么的问题上来了。

第一，我认为这是与鲁迅先生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来从事文学活动的革命精神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起来的，因此，在‘五四’时期产生出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和它的主要的领导人——鲁迅先生，就不可能不接受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鲁迅先生当时，是非常间接的、不显著的。鲁迅先生在‘五四’时期，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基本上还是一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信奉者。所以在‘五四’时期的鲁迅先生的著作中，虽然主要地表现了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的精神和意志，但总不免呈现出一些消极和悲观的气氛。这种消极和悲观的气氛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不外两个：他没有看清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没有发现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转移乾坤’的伟大力量。因为这样，他在前期的作品，虽然也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但不能明确地指给读者以一条前进的道路，不能强有力地鼓舞起人们向前迈进的信心。所以，鲁迅先生前期的作品，就不能不是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范畴的。

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不断的发展，由于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对于中国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的大举屠杀，更由于中国共产党

領導全國人民的百折不撓的鬥爭，魯迅先生對中國政治的現況和前途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就在這種形勢之下，魯迅先生開始認真地從事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和蘇聯文藝理論書籍的翻譯的工作。就在這個時候，魯迅先生開始掌握了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開始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獲得了絕大的鼓舞和支持的力量，而同時，也就開始以自己的文學創作——特別是雜文——當成是黨和人民的總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在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上發揮了無比偉大的作用。馮雪峰同志說：‘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非常密切的關係，最主要的可以說都很明顯地反映在他晚年的全部著作上面了。他晚年的著作最深刻和充分地反映着那十年的人民革命鬥爭，其中也就明顯地反映着我們黨的領導所給他的思想上的影響。’^①

這種思想上的影響，我以為主要地表現在魯迅先生始終堅持了列寧所提出的文學的党性原則這一重要事實上。在魯迅先生的後期雜文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麼一點，就是：與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利的，他竭力地擁護；與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害的，他竭力地反對。他一方面‘橫眉冷對千夫指’；另一方面又‘俯首甘為孺子牛’。他一方面無情地揭露和打擊了在社會中遇到的種種無恥、愚昧和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那些為人民和革命的利益而英勇犧牲的英雄人物的光輝燦爛的形象，他永遠地以他的作品服務於人民而不計其他。

這就是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之所以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高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時，也是我們應該向魯迅先生學習的第一點。

第二，這又是與魯迅先生的嚴格地要求自己，長期而艱苦地進

① 馮雪峰：‘論文集’（第一卷）第二四三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行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精神分不開的。毛主席這樣地教導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①而這個改造的關鍵，就在於要我們‘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魯迅先生在左聯時期，是完全被剝奪了和廣大工農羣衆直接接近的可能的，然而，魯迅先生的爲人民服務的堅強的意志，又使他不能放下文藝的武器來。於是，魯迅先生就不得不在和廣大工農羣衆隔絕的環境之下，來進行他的自我改造的工作，來批判他的早期的建立在個人主義思想基礎上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而這項工作，也就不得不成爲更其艱鉅的了。在這裏，我們正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驚人的思想毅力來。

馮雪峯同志在‘回憶魯迅’一書中，曾經這樣地提到魯迅先生在後期開始時的自我思想鬥爭的情況，他說：‘他當然不是屬於“純從自身的利害着想而跑過去”的那一類型的，然而他也必須要“跑過去”；這樣，在他就必須先對於革命和將來有明確的認識，必須深知“真理之所在”，必須肅清自己的“懷疑”和某些“悲觀”，也自然就要否定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立場，雖然在他那裏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並且要根本地否定作爲這階級立場的基礎的個人主義思想與感情。我認爲這是魯迅先生那時候的自我思想鬥爭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問題。由於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幫助，這個自我思想鬥爭的結果，魯迅先生不滿足於自己僅做一個小資產階級急進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家，而是堅定地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成爲一個共產主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七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義者，一個共產黨人的親密的同志（雖然沒有組織關係），這是他的勝利和他的偉大的所在。’^① 在同一書中，雪峯同志還敘述過當魯迅先生克服了他前期思想中的某些‘積習’或‘病症’（失望的情緒和懷疑的思想）的時候，他是感到如何的輕快與喜悅，而他的基於無產階級立場的戰鬥的意志，又是如何特別地高揚。正因為魯迅先生能够毫無保留地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化戰綫前哨上的一個戰士，所以他才能够寫下來那麼多的光芒萬丈的雜文，以革命的進取的無畏精神教育人民，同時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永垂不朽的作品。

這是魯迅先生後期雜文之所以能够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高度的第二個重要原因，而這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切實地向魯迅先生學習的地方。

第三，我們還必須指出：魯迅先生極善於繼承和發揚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而他後期的富有戰鬥精神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雜文，便是從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和他前期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來的。一九五一年六月號‘布爾什維克雜誌’的社論——‘蘇聯文學在新的高漲中’一文，曾經這樣明確地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與俄國古典文學作家之間的正確關係：‘蘇聯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是建立在吸收並且批判地改造過去文化的基礎上的。蘇聯作家記住而且深深地重視俄國古典文學作家、首先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遺言……蘇聯作家是以他們是俄國文學巨匠的學生和繼承者而自豪的。’^② 沒有疑問，我國‘五四’運動時期的以現實主義為其主流的新文學，正是在繼承了我國古典現實主

① 馮雪峯：‘回憶魯迅’第二八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② 鄭伯華等譯：‘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個問題’第五六——五七頁，文藝翻譯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